

## 念念在诗

——深切怀念是永骏先生

王中忱

二〇二四年一月一日，天气晴好，我坐在电脑旁给日本的亲友们写贺年信。日本自“明治改历”后废止了旧历春节，西历一月同时被称为正月，元旦也是正月初一。还记得住在日本时看到元旦前夕人们早早去挑选“年贺状”（贺年卡）的情景，也体会过邮局在元旦之日把“年贺状”恰到好处地送到门前的感动，互联网普及以来，电子邮件逐渐取代了纸质的贺卡，便捷快速，贺年的气氛却淡了很多，而在中国，元旦和正月初一分离，自然更不易产生“过年”的心情，但对几位至亲至敬的日本师友，我一直想着元旦贺年，并坚持在元日早晨发出。今年给是永骏老师的贺年邮件是用日文写的，其中一句说：“您的知性风貌一直在激励着我”。是永老师很快就回复了，用中文，一如既往的睿智和幽默：“新年（龙年）快乐！日本国人口之百分之一十是八十岁以上，却是已经老态龙钟。也说‘双袖龙钟泪不干’。‘龙钟’是拟态词吧。”他引用了唐人岑参的《逢入京使》，让我想起这诗的最后一句“凭君传语报平安”，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是和是永老师的最后一次通信。

第一次见到是永老师是在一九八三年夏季的一天。此前有过通信来往，知道他作为外国专家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为将要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授课，学期结束时专家们有风景名胜游，他却决定放弃，一个人到北京查阅有关茅盾的资料，而我那时刚好借调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搭建的《茅盾全集》编辑组。

是永老师很细心，从大连写来的信不仅约了时间和地点，还说届时他手上会拿一本杂志。但见面那天我没有看接头暗号就认出了他：挺拔，潇洒，英气焕发。我们一见如故，倾谈知心。我陪他拜访了茅盾的儿子韦韬先生，韦韬特别夸赞是永的汉语说得标准流利自然得体，两人开怀畅谈，毫无隔阂，后来也保持了很深的友谊和信任。

是永老师送给我三小册论文抽印本，这形式当时很让人感到新奇，而更让我感叹的是论文内容。这三篇论文分别是《茅盾〈子夜〉校勘记》（1971）、《〈蚀〉的改作》（1974）、《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文体》（1979），前两篇是对《子夜》和《蚀》一九四九年前版本与一九四九年后修改本的精细比勘，并由此追问了作家修改的动机与相关原因，这种实证性考察，无论在中国的传统学术里还是在今天的学术界都不足称奇，但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虽然进入了“新时期”，刚刚复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频频可见用一九四九年后的修改本论证一九四九年前作家思想和文学的论文，甚至在《茅盾全集》编辑组内部，也曾就以初版本还是修改本作为《全集》底本的问题发生过争论，最后议定双向尊重原则，《全集》收录以修改本为底本，但在注释里把初版被删被改的内容适当录出，这中间，是永老师的茅盾版本对勘研究，肯定潜在地发挥了“他山之石”的影响。

《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文体》的标题显示了作者立意远大，文内所论则聚焦在了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且不说当时中国的茅盾研究界的关注热点仍在《蚀》三部曲和《子夜》，争论焦点也大多执着于茅盾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而是永老师的《霜叶》分析着眼于茅盾的小说文体，从句式构成到情景描叙，乃至叙述者的位置、视点转换与人物描写之间的张力，其文本细读的方法别开生面。那时我正协助孙中田先生编辑茅盾研究会的会刊，我们请是永老师把这篇文章转译为中文，发表在《茅盾研究》第二期（1984.12），和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论茅盾》同栏。是永老师的论文首次在中国发表，就让人

感觉耳目一新。

## 二

那以后，是永老师陆续接到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和有关大学的邀请，他研究茅盾的新见也不断发表在中国的学术会议或学术杂志上，在我看来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篇，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他在第四届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所做的报告。

那是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茅盾研究学术会议，地点在厦门大学，海滨城市的温煦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热潮正相搭配，多位参会的外国学者都很开心，来自加拿大的陈幼石教授放言高论，苏联科学院索罗金教授开怀豪饮，都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会间花絮。而来自日本的学者最多：老一辈学者松井博光，后起之秀是永骏和白水纪子，显示了雄厚实力。是永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茅盾小说文体与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在一贯精细的文体分析基础之上，把议题提升到有关“现实主义”讨论的理论层面。是永老师援引了日本的英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篠田一士的《二十世纪十大小说》。篠田一士选择的十部小说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博尔赫斯《传奇集》、卡夫卡《城堡》、茅盾《子夜》、多斯·帕索斯《U·S·A》、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乔伊斯《尤利西斯》、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岛崎藤村《黎明之前》。篠田对现代主义文学相当熟稔且相当赞赏，但也对其俨然成为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不无批判，他把书的序言题目定为“在多元化的世界文学之中”，显然不愿见到主潮成为独霸，所以他把《子夜》选入“十大”，并高度评价其“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上”的“先驱性”。是永老师在报告中强调说：“篠田的这样的评价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同时也认为篠田“把普鲁斯特的小说世界和茅盾的现实主义对立起来的看法并不正确”，他更赞成把茅盾和马尔克斯进行比较，认为除了魔幻因

素以外，茅盾和马尔克斯一样，“是把社会、政治、美熔为一炉，探索全体小说的作家”。

但在中国，《子夜》的经典位置正发生动摇，其写法被视为陈旧落后，甚至被指为“主题先行”的范例。这自然有其缘由。官制现实主义长期造成的创痛未愈，刚刚开眼看世界的目光也难免单纯，一条直线般的把现代主义当作评价标准和追逐目标，在这样的氛围中，是永老师的提示可谓逆耳良言，好在当时学界尚有开放接纳的胸怀，他的报告不仅在研讨会上引起正面反响，后来还被《文学评论》杂志选去刊用（发表于该刊1989年第4期）。

是永老师来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我们见面机会多了，交谈的话题广了，偶尔也会听他谈到个人的经历，但很少，我也从来没有接着问。一九八九年四月，在是永老师的指导、帮助和不懈努力之下，我得到日本留学，在他门下受教，有了更多聚谈，但仍然没有问过他的个人成长之路。对于学生来说，老师一直就是你眼前的模样。不过我确实好奇地问过“是永”这个姓氏，因为在我的接触范围中，不像“田中”“小林”那样常见，是永老师笑说他的弟弟曾考察过家族历史，但他本人从未留意。由此说到他的父亲曾做过新闻记者，弟弟则在东京从事戏剧艺术，但话也就到此为止，直到很晚以后，我在《大阪大学世界言語研究センター論集》第一期（2009年）上读到是永老师的访谈记，才更为真切地了解到他的文化家庭氛围和他成长的历程。在访谈中，是永老师说到他父亲的藏书，其中“有筑摩书房版《现代日本文学全集》100卷”，是他高中时代着迷的读物，而大约同一个时期，岩波书店出版的竹内好译鲁迅的《野草》、史沫特莱撰写的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也让他感动，正是这些因素相互叠合，把他对文学和对中国的兴趣同时激发了起来。一九六二年他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后来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便跟随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相浦杲先生走上了学术之路。

二〇一二年，是永老师出版了茅盾研究专著：《茅盾小说论－幻想

与现实-》，他把书的后记同时称为“解题”，显然包含自我回顾和总结的意思。他从养成自己文学观的日本文学环境入手，解释自己亲近茅盾小说的原因，他写道：现代的日本文学，一方面是把法俄英美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主流摄取进来，对亚洲文学却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则反复称说要克服这种“西洋志向”，并进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学风土。是永老师当然注意到日本文学当中，也有作家试图克服“私小说”而去开拓新的小说世界，注意到日本文学风土里“私小说”与“非私小说”的纠结和博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中，他感受到了茅盾小说与“私小说”完全异质的清新。沿着这样的脉络，应该也可以说，恰恰因为是永老师置身于与茅盾文学异质的文学风土，并具有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跨文化理解他者并将自身相对化的自觉，才使他的茅盾解读充满了洞见。

### 三

在同一篇访谈里，是永老师说到他的学术工作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国现代小说，特别是茅盾的小说，一是中国现代诗，特别是从“文革”期间到“文革”之后“如彗星般出现的诗人群”，亦即当时被称为“朦胧诗”或“新诗潮”的先锋诗人群。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重心应该在前者，但后者也已经着手。一九八五年我转到丁玲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牛汉特邀北岛编选诗歌稿件，遂使《中国》成为长期处于地下写作的先锋诗人大规模公开登场的平台，随后，因为有吴滨、邹进两位“新诗潮”的新锐进入编辑部工作，《中国》杂志上的先锋诗歌更呈一时之盛。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国》杂志已被决定停刊，编辑部同人也编好了“终刊号”，而北京大学学生举办的首届艺术节决定把最佳文学杂志奖授予给《中国》，把优秀诗人奖授予给北岛。一天晚上，我和编辑部同人陪着牛汉、北岛到北大领奖，北岛做

了简短而精彩的发言，我复印了一份寄给是永老师，因为知道他正在翻译北岛的诗。

不过是永老师翻译《北岛诗选》的出版接洽开头并不顺利，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写给我的信说：“《诗选》，到现在两个出版社估计没有销路，拒绝出版，我在继续找。”同年四月十九日的来信仍说：“我还没有找到出版社。有一个出版社社长看了我的译稿的一部分说‘译得真好，北岛的诗比得上马雅可夫斯基（那个出版社以前出版了马诗集三册），很想出版，但是现在亚洲方面的诗没有销路，暂且不能出版’。我一边翻译，一边继续努力找到出版社。”要到若干年后我才能明白，为什么在日本“亚洲方面的诗”会被那样斩截地认定“没有销路”。明治以后的日本，“脱亚入欧”成为社会文化主潮，二战以后崇欧情结扩展到了崇美，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文学却仍然不受待见，那些出版人对图书市场的判断当然是直接而真切的。但从后一封信里也可看到，北岛的诗作本身，是永老师的翻译质量，都具备打动和吸引行家识者的魅力，所以随后便出现了转机，一九八八年二月，他给我寄来《北岛诗集》日译本，土曜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北岛诗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们在厦门大学参加茅盾研讨会，但在会下，交谈的话题更多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我陪是永老师到鼓浪屿见舒婷，第一次看到《今天》杂志的原刊。舒婷慷慨，把她收藏的几册都借给我们复印，在回厦大的路上，海风吹拂，轮渡摇晃，是永老师小心翼翼地抱着装有《今天》的挎包，那珍视和兴奋的神情，至今如在眼前。

那一时期是永老师的工作重心明显转到了中国当代先锋诗，尤其是翻译，可说是一个爆发期，从《北岛诗集》发端，到1990年代中期，他连续翻译出版了北岛的第二部诗集和小说《波动》，芒克的两部诗集。一九九一年是永老师以译作《芒克诗集》获得历程奖，这是为纪念著名作家岛崎藤村设立的文学奖，主要颁发给活跃于创作第一线上的日本

作家艺术家，鲜少奖给翻译，授予给中国当代诗歌翻译，更是绝无仅有。颁奖词特别称扬译者的日语表现力，表明是永老师不仅把中国诗翻译成了日语，更是翻译成了高品质的诗。中国的现代诗，经历了“文革”大劫难浴火重生，在北岛、芒克这一代诗人手上，淬炼成为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前卫行列的艺术，本来就是奇迹，而在日本，遇到了是永这样的翻译者，使其转换为日文以后，并没有局限在一般所谓汉学家的小圈子里，而是直接汇进了正在生动行进的同时代日本文学场域之中，这同样堪称奇迹。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说，都是难得的幸运。

#### 四

后来知道，是永老师自己也写诗，在大阪外国语大学，他被视为诗人。外大不大，还在帮助我申请留学的时候，是永老师就提醒我说，不要用中国的大学规模想象我们的学校，我们是一所很小的大学。到了这里，看到学校主区仅有教学栋、研究栋和图书馆三座建筑，确实见识了单科大学的紧凑。但大阪外大语种众多，后来设立的研究机构名为世界语言研究中心，可谓名符其实。其中亚洲语言尤为齐全，并且一直充溢着浓厚的文学氛围，毕业于蒙古语学科的司马辽太郎和印度语学科的陈舜臣，作为畅销不衰的作家，一直是外大的耀眼名片，而校内老师也多有很高的文学品味，我曾听研究蒙古文学的荒井教授谈是永老师的译诗，他特别欣赏其间的节奏和韵味。而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则笑着说，有时在校园里看到是永老师不知道是否应该打招呼，因为他旁若无人，仿佛进入了诗人的冥思。

其实在外大的校园里我也见到过是永老师漫步沉思的身影，当然是悄悄从旁绕行。后来读他写在诗集《宙の上》（2016）后记里一段散文诗般的文字，感觉约略窥见了他沉思世界的一斑：“在意识的角落里，从废墟上升腾而起久不消褪的青空残像，似乎是生存于二战之后人们的

原风景。徘徊于此世与冥界的边缘，沉醉于芜村辞世时吟咏的白梅，生活在末世意识的深渊，在幻觉中看到了白色的莲花。”然而同时我也知道，是永老师并非一味纠结于自我内心的人，他的人文情怀浓厚，有情有义有担当。他翻译中国的先锋诗，也关心诗人们的命运，为帮助流亡海外的诗人挺身而出，为了支持《今天》在海外复刊，甚至担任了琐碎的发行事务，这绝非一般的翻译者所愿为和能为。而二〇〇三年他出任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应该也是临危受命，因为那时日本的国立大学正在“法人化”，学校经费由国家全额拨款转为部分自筹，作为一所单学科的文科大学，处境肯定是比较难的。

回国以后我和是永老师时有通信，但很晚才知道他当选为校长，而且还是听外大别的老师说的。后来又听说，外大将和大阪大学合并，而说是合并，由于两校规模完全不对等，从一定意义上也是被并，校内教授会上难免发生争议，甚至有人质问校长是否和大阪大学订了密约，将在合校后出任大阪大学的要职，而校长则当场堂堂明言，合校之日，就是他离开外大之时，他绝不会去阪大。有人说，这尽显了他“九州男儿”的本色。

但这些都是听说，我直接听是永老师言及，已经是外大并入阪大一年多以后。二〇〇九年二月，我在京都大枝山里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一个星期日，是永老师约我到京都市内的高岛屋午餐聊天，当然说到外大合并，他问我怎么看，我说，作为在外大学习过的留学生，我对母校的解散感到难过，但从我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经验看，综合性大学确实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从长远看并入阪大是好事。他静默地听，啜了一口茶，略为安心的神情。餐后我和他去京都站，看他乘上开往九州的新干线。外大并校后，所有教师和在校学生都转到了大阪大学，只有作为校长的是永老师没有接受大阪大学的任何头衔。他转而受聘于私立的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校址九州大分，他的家乡，一个风光旖旎的温泉之乡。

最后一次见到是永老师，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那时他已经从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校长的位置上满期退任，而我又一次来京都大枝山里的日文研做访问研究。这年五月，日本政府公布春季叙勋名单，是永老师因为教育工作的业绩获得“瑞宝中绶章”，应该是很大的荣誉。大阪外国语大学同窗会咲耶会预定在十一月十六日举办祝贺会，但我不巧十二日要回北京停留一个星期，于是给是永老师写邮件抱歉不能参会祝贺，但二日可来参加同样是由咲耶会主办的同窗会年会，这次活动特约是永老师讲演。是永老师回信把叙勋事情看得很淡，说他现在“只愿闲散逍遥”。同窗会年会的晚餐结束之后，是永老师喊我和青野繁治老师去车站前面的餐馆“二次会”，演讲之后的他仍然兴致勃勃，我们一起谈了好久，但完全没有涉及他的叙勋，那次，是永老师很郑重地委托给我一件事：把他搜寻多年的诗人戈麦的诗稿和相关资料转给戈麦的好友、我的同事西渡，他希望这些能对最为尽心整理和研究戈麦诗歌的西渡有所帮助。

本来约好二〇二〇年二月，在我访问研究将要结束的时候，和是永老师、青野老师在京都再聚，但随后新冠疫情在日本也变得严重，聚会之约不得不取消。二月八日，是永老师来邮件说会在月底把戈麦资料整理好寄给我。二十五日，他再写邮件来，说疫情搅得心绪不宁，戈麦资料还没有整理完，同时确认我在日文研的地址。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北京也不断传来紧张消息：学校转为线上上课；回国后需要隔离，等等。三月九日，他邮件告知戈麦资料已经寄出，里面还附有他研究戈麦的论文抽印本。十日下午，我写邮件报告妥收，他随即回复说“放心了”，要我替他“向西渡问好”，并说：“如果他对我的论文感兴趣，就请给他翻译或扼要地介绍内容”。

一如既往，他的心心念念仍都在诗。